

中国教育大系

20世纪中国教育（三）

总主编 顾明远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
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国教育大系

20世纪中国教育（三）

总主编 顾明远

长江出版

社

编 者 的 话

(一)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光辉的篇章。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教育,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它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在教育领域里长期的探索和创造,有着极其丰富、生动的内容。它不但为争取整个革命斗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且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设新中国教育的基础。我们应当重视和深入研究并继承这份历史遗产,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借鉴。

(二)长期以来,对革命根据地教育的研究,曾经几度起落。近十年各地有组织地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特别是收集、整理、出版了大量的资料,各地出版了很多地区性的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董纯才主编,张腾霄、皇甫束玉副主编)也已经问世,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其中也不乏有水平的文章。但总的说来,系统、深入的,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较少,对指导思想及其实践发展规律的较深层次的研究也很不够。

本卷根据上述研究材料选编而成,力求在有限的篇幅中提供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和基本文献资料,以供读者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

(三)本卷分为四个部分:(1)“概述”,引言部分简要回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教育领域里的活动。其后分三个时期依次叙述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发展历史。它是从董纯才主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一书的有关部分中节选、缩编和整理的。个别段落选自陈元晖主编的《老解放区教育简史》。(2)“主要方针、政策、法规、文献”,选编了三个时期革命根据地中央和地方的主要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3)“研究论文选”,选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报刊上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论文。(4)“教育大事记”,是根据皇甫束玉、宋荐戈、龚守静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一书摘编的。

(四)选编资料、文献均保持原貌,个别字句作了校正修改。所选资料以中共中央所在的根据地为主,同时也尽量选录反映其他各根据地有不同情况和特点的资料,其中也包括了观点不尽相同的论述。各部分还附录了有关参考资料的选目,以便于读者研究。

(五)本卷一、三、四部分由宋荐戈选编,第二部分由龚守静选编。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和错误的地方敬请指正。

目 录

一、革命根据地教育发展概述

引言	(1856)
(一) 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教育	(1859)
1. 苏区教育的发展	(1859)
2. 苏区教育的成就	(1862)
3. 苏区教育的历史贡献	(1863)
(二)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教育	(1866)
1. 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发展	(1866)
2. 抗日根据地教育的成就	(1870)
3. 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历史贡献	(1871)
(三)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教育	(1875)
1. 解放区教育的发展	(1875)
2. 解放区教育的成就	(1878)
3. 解放区教育的历史贡献	(1879)
(四) 结束语:对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几点基本认识	(1881)
附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主要专著目录	(1887)
附二:革命根据地教育资料选编参考书目	(1887)

二、主要方针、政策、法规、文献

(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888)
闽西苏维埃政府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节录)	(1888)
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文件(节录)	(1890)
鄂豫皖区文化教育委员会巡视纲要	(189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节录)	(189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文字第一号)	
——确定教育原则,为今后实施教育方针	(1892)
第二次闽浙赣省苏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	(189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	
——目前的教育任务	(1896)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三号)	
——关于新调来的教育干部训练问题	(1898)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四号)	
——文化教育工作在查田运动中的任务	(1899)
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	
——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	(190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十七号)	(1901)
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决议案	(190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八号)	(190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九号)	(1906)
托儿所组织条例	(1906)
红色教员联合会暂行章程	(1907)
消灭文盲协会新章程	(1908)
短期职业中学试办章程	(1909)
高级师范学校简章	(1910)
小学教员训练班简章	(1911)
教育行政纲要(原名教育工作纲要)	(1911)
小学管理法大纲	(1914)
夜学校及半日学校办法	(191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节录)	(1918)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概况	(1918)
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	(1920)
苏维埃的教育政策	
——凯丰在一九三三年十月苏区教育大会上的报告	(1923)
论消灭文盲运动	(1928)
附:参考文件目录	(1931)
(二) 抗日战争时期	(1932)
陕甘宁边区中央教育部关于冬学的通令	(1932)
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的实施原则	(1934)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节录)	(1935)
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第十四号通令 关于消灭文盲及实行办法	(1935)
陕甘宁边区小学法	(1936)
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	(1937)
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	(1940)
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	(1941)
陕甘宁边区实施普及教育暂行条例	(1942)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节录)	(1943)
山东省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节录)	(1943)
晋西北第二次三科长联席会关于发展与巩固广泛的文化教育	
统一战线的决议	(1945)
打碎旧的一套	(1946)
提高边区国民教育	(1948)
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	(1949)

附:抗日根据地主要干部学校简介	(1951)
教育上的革命	(1953)
提高边区国民教育	(1954)
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	(1955)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1956)
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	(1958)
盐阜区行政公署中学暂行法	(1960)
盐阜区行政公署中学暂行规程	(1961)
盐阜行政公署第二次文教扩大会议决议	(1968)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整理小学加强儿童生产教育的指示	(1970)
晋冀鲁豫边区民众学校暂行规程	(1973)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加强游击区小学的领导打击与争取 敌伪小学的指示	(1974)
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	(1976)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提倡小学民办公助的指示	(1977)
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	(1978)
苏中教育会议关于小学改造和私塾管理问题的决议	(1981)
苏中教育会议关于普通中学改造问题的决议	(1981)
中共冀鲁豫分局关于普通教育改革的指示	(1983)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关于边区教育方针的决议草案	(1985)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检查边区教育历史	(1988)
新教育方针收获巨大 ——文教大会教育组研究现状	(1990)
今年苏中文教工作的任务	(1994)
附:参考文件目录	(1995)
(三)解放战争时期	(1997)
苏皖边区国民教育实施法(草案)	(1997)
苏皖边区的教育	(2000)
东北政委会关于改造学校教育与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	(2002)
山东省当前教育工作纲要(节录)	(2004)
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	(2006)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决定	(2008)
关于贯彻民办公助政策经验的初步总结	(2010)
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2014)
三年来东北教育工作的初步总结和今后的方针任务(节选)	(2017)
恢复与发展中等教育是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	(2020)
东北局政委会关于加强工人群众中政治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	(2021)
1949 年华北区文化教育建设计划	(2023)
华北小学教育会议总结报告	(2024)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举办城市中小学教师暑假集训的指示	(2028)
山东省教育厅四年来的教育工作总结报告	(2028)

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	(2031)
附:参考文件目录·····	(2033)

三、革命根据地教育专论

学习老解放区教育经验的体会·····	董纯才(2035)
老解放区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若干经验·····	成仿吾(2041)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小学中进行劳动生产教育的经验·····	刘松涛(2043)
老解放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戴伯韬(2047)
谈谈老解放区的干部教育·····	张腾霄(2050)
试论中央苏区教育工作的基本经验·····	许成人(2053)
教育史上一桩值得回味的公案 ——苏区教育方针争议述评·····	陈桂生(2056)
陕甘宁边区教育基本经验初探·····	张孝亮(2059)
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两次教育改革·····	任钟印(2064)
回顾在延安十一年的教材编写生活·····	辛安亭(2070)
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办好《教育阵地》·····	刘松涛(2075)
附:革命根据地教育研究论文选目·····	(2081)

四、革命根据地教育大事记

一、革命根据地教育发展概述

引 言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从革命性质、革命领导权到革命动力,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都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沿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道路前进。

五四以后,马列主义传到了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即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革命的方向、道路问题。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新文化、新教育运动的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萌芽、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工农群众为主要对象,和革命斗争相结合,和劳动相结合。

为了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共产主义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他们积极地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重视劳动群众中的教育工作。并且,这种教育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力量的壮大,教育规模、教育对象以及教育组织形式、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都处在变革的过程中。

1919 年 2 月,在北京出版的《晨报》上,李大钊就提出劳动教育问题,主张在教育上人人机会均等,劳动者必须有受教育的机会。同年,在《新生活》这个五四时期著名的通俗刊物上,他以“工读”为题,提出了“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①的意见,并利用中国“耕读传家”的古训,改为“耕读作人”,宣传在劳动中补习,边劳动边学习。他写了许多重要的文章,鼓励青年学生到劳动中帮助劳动者学习文化,提高觉悟,同时向他们学习。

1918 年 4 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在湖南成立了“新民学会”,经常集会讨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研究马克思主义,又派了不少会员和湖南革命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探讨革命理论。

为了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灌输革命思想,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利用假期进行街头讲演并到北京近郊的卢沟桥、丰台、长辛店等地对工人和农民讲演。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 1923 年。

以邓中夏为首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于 1921 年 1 月,在长辛店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教员除邓中夏外,还有张昆弟、何孟雄、朱务善等。李大钊曾到学校视察。学校白天教工人的孩子,晚上教工人。教学内容注重贯彻阶级教育。这所学校在中国现代工人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期间,上海和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都办起了工人学校,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

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大体上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革命教育的发展,并为开展革命教育创造了条件;而随着革命教育的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在劳动人民中扩大,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壮大。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进一步推动了革命教育的发展。在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针对当时的情况,都提出教育问题。1922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改良工人待遇”“保护女工和童工”“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的权利”“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②。1922 年 5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中,提出要开展“青年工人和农民特殊教育运动”,提出“工人愈无知,资本家便愈容易加以掠夺和压迫,我们务必将这可怕的情形,唤起青年工人为争取教育权而奋斗,并努力从事识字教育和阶级斗争的教育运动,普遍地启发一般青年工人的阶级觉悟与斗争能力”“至于农村对青年农民尤应努力作特殊的教育运动”。总之,党十分重视在工人农民中开展广泛的教育,并取得了成效。

在革命教育中,随着工人群众中涌现出大批的先进分子,不少人成为干部,领导工人运动,这就自然地出现了群众教育与干部教育问题。

在干部教育方面,一方面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不少人是白天工作,夜间学习,由于这些人有高度的革命性与主动性,学习的效果一般是很好的;一方面是成立干部学校。现就几所当时影响较大的干部学校,简介如下:

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利用湖南长沙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最早的干部学校。1921年8月创立。1922年12月,李达应聘任校长。开始录取学员共计24名,毛泽东本人和校内工作人员,当初也是学员。在《组织大纲》中规定,“暂设文、法两科”,文科设有:中国文学、西洋文学、英文、论理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新闻学、哲学;法科设有: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每人选其中一个科目。此外,还注意劳动教育,强调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学校有自己独特的教育制度与学习方法,注重学员自学,反对教员单纯的灌注方式。湖南自修大学为党培养了很多优秀干部,如何叔衡、毛泽东、夏曦、夏明翰、郭亮等。该校于1923年11月被当局派驻军强行关闭。接着,党在长沙开办了湘江学校,自修大学的许多学员转入这个学校。

上海大学。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1922年10月成立,校长于右任。1923年,邓中夏、瞿秋白先后到校任领导职务。学校成立评议委员会(后称行政委员会)处理全校重大事务,委员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等。学员开始有160人,后增至300人,最后达800人。学校设社会学系、中国文学系、美术系和英国文学系,另设中学部和俄文班。学校曾有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著名学者任教,如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沈雁冰、肖楚女、陈望道、杨贤江、邵力子等。1927年4月,国民党军队进驻学校。同年5月,学校被国民党政府关闭。

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党在广州举办了一至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至五届培养广东、广西、湖南等8省农民运动干部;第六届学员是来自全国26个省(区)的农民运动干部。1927年3月到6月,党在武昌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湘鄂赣等17个省培养了800多名农民运动干部。此外,这一时期其他许多地方也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或农民运动讲习班。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主任为彭湃,第二届主任为罗绮园,第三届主任为阮啸仙,第四届主任为谭植棠,第五届主任为彭湃,第六届主任为毛泽东。设在湖北武昌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常务委员为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等。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育内容,注重理论、历史、现状的学习。具体内容分为四类:(1)基础理论课,如《帝国主义》《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2)专业课,如《中国农民问题》《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3)革命文艺课,如革命歌曲等;(4)军事课,包括理论教育、实地调查、军事操练三个方面。毛泽东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彭湃讲授《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等,周恩来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肖楚女讲授《帝国主义》等,李立三讲授《中国职工运动》等。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毕业后,深入农村艰苦工作,英勇战斗,成为革命队伍的骨干力量,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平民女校。这个学校是1921年12月在上海由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一所培养妇女革命干部的学校,学员来源大部分是在新思潮影响下进步的青年妇女。教员有陈独秀、沈泽民、沈雁冰、邵力子、李达、陈望道等人。刘少奇曾到该校指导学员学习并作讲演。

劳动学院。这个学院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广东、香港各工会开设的培养工人运动干部的学校。1926年5月成立,院长为邓中夏,担任教授的有刘少奇、肖楚女等。

黄埔军官学校。1924年国共合作后,为组织培养革命军人,在广州黄埔创办军官学校。1923年底和1924年初,国民党内决定由廖仲恺、蒋介石等人筹办,并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1924年5月,学校正式成立。孙中山任学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仿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设党代表、政治部。周恩来1925年担任政治部主任。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学校改变性质,成为破坏国共合作、反对革命的工具。

这些培养干部的学校,有些是统一战线性质,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办起来的;有些是中国共产党办的。这些学校和旧的大学不同,学员首先是要革命的,入学主要不是凭一次的考试,而是根据他们实际的文化和政治水平作为取舍的标准。课程的设置,根据革命的需要,既有马克思主义及其他革命理论,又有各门科学和实际应用的知识,既注重课堂的教学,又注重实际的操练;既注重书本知识,又注重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农村各阶级的关系。学校毕业的学员绝大部分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有的参加部队,进行武装斗争,他们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个时期的社会教育或群众教育,是和群众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以平民夜学、补习学习等方式进行教育,特别是结合斗争实践进行教育。工农群众运动的过程就是广大工农群众受教育的过程,许多劳动群众逐步摆

脱旧的传统观念,打碎统治阶级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逐渐接受进步思想和革命思想。

这个时期,在工人运动中除了北京长辛店等地铁路工人运动外,主要的是江西安源路矿工人的罢工运动。安源路矿是中国封建买办官僚勾结德日帝国主义经营的。工人生活十分困苦,工人中流行这样一个顺口溜:“来到安源三五年,萍矿做工苦难言。家中父母倚门望,回家没得路费钱。”1921年,刘少奇、李立三等中国共产党人来安源做发动工人的工作。首先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领导工人斗争,曾经办工人夜校。1922年1月,组织了“路矿工人补习学校”。这个学校不收学费,只根据个人的经济能力,出一点笔墨纸张费。上白班工人夜读,夜班工人日读。最初60多人,按程度分为两组。自编教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迪工人,发展党的组织。通过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启发了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培养了骨干,仅4个多月,就把工人组织起来了。随着罢工斗争的胜利,补习学校扩大到200多人。到1923年1月,补习学校分为3个分校,学员就更多了。在办工人补习学校的同时,还办了国民学校,它是路矿工人的子弟学校。国民学校到1923年也扩大为3所学校,初小四年制,可收部分工人子女免费入学。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视工人教育的同时,特别重视开展农民运动,进行农民教育。在中国南方省份,特别是湖南和广东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农村工作,发动劳动农民起来革命。毛泽东和彭湃不仅创办和主持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而且深入湖南、广东等省的农村,进行调查。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分析了农村阶级状况,总结了农运的经验,指出了农运的方向,有力地推动了农运工作的发展。在这期间,党通过开会作报告、办训练班、办农民夜校等方式,教育了劳动农民,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为后来开展革命战争、开辟农村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得到广泛发生、发展,为中国革命斗争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①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5月版,第85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第492页。

(一) 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教育

1. 苏区教育的发展

土地革命时期,以中央苏区为首,全国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创建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是不尽相同的。但是,从发展过程看来,苏区教育从1927年冬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起,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止,历时十个春秋,大体都经历了创建、发展和艰苦坚持三个阶段。

(1) 苏区教育的创建阶段(1927年10月—1931年11月)

苏区创建有前有后,时间有长有短,情况不同。但其共同特点都是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 and 激烈的群众运动中进行的。这个时期,红军天天在打仗,很难区分前方和后方。几乎每个人都是战斗员,每个人都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党内,主要是教育党员认清革命形势,明确斗争任务,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奋斗。在红军内,主要是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加强红军自身的教育,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红军除了打仗外,还要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在工农群众中,主要是进行翻身求解放的教育,分配土地的教育以及红军是劳动人民自己军队的教育,从而使工农群众积极帮助红军作战,踊跃参加红军等。识字教育也是从属于政治思想教育的。从教育形式来讲,主要是即人即事的教育和训练班的教育,还采取作报告、上政治课、早晚点名讲话、工作总结、个别谈话、举行各种纪念会和追悼会以及开展各种游艺活动等。这个时期,学校教育很少,主要是办训练班。训练班时间的长短因环境而定。有的三五天,有的一星期或十多天。这种训练班对于推动工作的开展和干部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可以说是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甚至当时国民党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教育群众方法可学,不识字的农民,他们都能使之讲得很多道理”^①。

在社会教育方面,一般是结合土地革命进行。土地革命的教育是最实际的教育,随着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逐步向农民进行政治教育与阶级教育。

在普通教育方面,有的苏区已经开始创办小学。苏区小学为了教育学生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支援前线工作和土地革命斗争,十分注意教学的政治性与实际性,要求学与用密切结合,课堂教学与社会活动密切结合。不过,除个别苏区外,这个时期苏区的小学还没有大规模地发展起来,而且小学的管理体制、修业年限、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的聘用和待遇都没有统一的规定。

这个阶段,为了推动教育工作的的发展,各个苏区已经从斗争的实际出发,制定了各自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例如1930年7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教育计划委员会提出了以下的教育方针:(一)养成在革命环境中所需要的革命工作的干部人才;(二)社会教育,普遍而深入地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政治水平、文化程度;(三)儿童教育:(甲)采取强迫性的教育,凡6岁至11岁的儿童有必须受小学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乙)施教方针,以养成智力和劳力作均衡之发展的原则,并与劳动统一的教育之前途^②。其他苏区制定的教育方针尽管表述形式不尽一致,但内容都是在强调教育要为革命的政治服务,教育要与劳动结合起来,要使劳动群众成为受教育的主体。由此可见,苏区的教育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是有本质不同的。

(2) 苏区教育的发展阶段(1931年11月—1934年10月)

在这个阶段,各个苏区先后不同程度地都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革命根据地分为前方和后方,巩固区与游击区。这时,敌人已不可能随时进攻根据地,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已经可以结合反“围剿”的斗争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因此,这个时期教育工作的任务是:“要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的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

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③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又明确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④

苏区的教育方针和政策是从整个革命斗争的形势出发制定的,是从文化教育工作的实际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它源于广大群众斗争的实践,具有强烈的群众性和实践性,因而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推动了革命教育工作的发展。

为了加强教育工作的领导,苏区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与健全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各种法规,召开了全苏区的文化教育建设大会,包括共青团、少先队、共产儿童团在内的群众团体都大力协同教育工作,从而为苏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不仅如此,在苏区还经常举行教育大检查。学校与学校评议,识字运动与识字运动评议。它对于发展提高教育的数量和质量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教育大检查把群众的革命热情引入到教育工作中,使革命的热情与持久的教育工作结合起来。

在干部教育方面,这个阶段苏区除继续开办必要的短期训练班外,还大量地创办了各类干部学校。例如,在瑞金就办起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列宁师范学校、红色医务学校、红军通讯学校、红军步兵学校和农业学校、戏剧学校等。这些学校有固定的校址,有比较正常的教学秩序,分设了专业,有比较统一的教学计划。学习的内容不局限于只是解决工作中和思想中的问题,而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各种专业知识。学习期限也相对地固定下来,一般学校是3个月或半年一期,也有一年一期的。学员结业时都要经过考试,考试及格者发给证书。这些学校根据需要制定了教学计划,还自编了不少教材。这些教材不仅有较高的科学水平,而且紧密结合实际的需要,从实际中提出问题,进行理论的分析,因此,学生学习进步是很快的。不过,在战争环境中,教学计划往往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制订教学计划与随时准备改变教学计划中来完成教学任务的。

在社会教育方面,这个阶段苏区普遍地开展了群众性的识字运动,夜校、半日校、识字班、识字组、识字牌、读报组、俱乐部等遍及乡村和城镇。为了推动这项工作,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曾经发出不少的指示和号召。例如1933年6月,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曾印发了《关于识字班工作的通告》,《通告》阐述了开展识字运动和组织识字班的重要性,指出识字班应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认识1000字,第二个阶段认识2000字,第三阶段认识3000字。每个识字班设班主任一人,负责组织识字班的各项工作。《通告》还对识字班的教学和工作方法作了具体的规定。

苏区的社会教育,有的还订出了突击识字运动的目标,开展了识字竞赛运动。在苏区之所以能够开展识字运动并且实现具体的目标,收到明显的效果,是因为建立在革命利益根本一致和需要的基础之上的。否则,这些识字的具体目标,便不可能在广大群众的范围内实现。

在普通教育方面,苏区普遍地发展了列宁初级小学和列宁高级小学、劳动小学等。例如:

1932年3月,湘赣省组织会议决定,在从3月15日至6月15日的工作竞赛期间要“普遍地建立列宁学校,每一乡设立一个列宁初小,中心县和大的县分设立列宁高小和女子职业学校”^⑤。

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等8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要求各地“以查田运动的胜利去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普遍地建立俱乐部、列宁小学、夜学、识字班、列宁室、书报阅览所和墙报等等,以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⑥。

除了这两个“决定”与“决议”外,各苏区还发出了许多关于发展普通教育的指示。这个阶段和前一个阶段不同,不仅改造了原有的小学,而且成立了许多新的小学校。这些小学一般不是用国民党时期的旧课本,而是使用新编的课本,这些新课本富有革命的内容,反映了群众的斗争和群众的生活。同时在小学校教师队伍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增添了大批工农出身的新教师,另一方面也对原有的小学教师进行了教育、改造与提高。

这个阶段,苏区在发展教育的过程中对于旧教育制度和旧教育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

早在1931年2月,苏区共青团中央局在《关于团在苏区中的任务的决议》中就指出:“应该注意不使在学校中还教三民主义及一切孔孟之书。”^⑦

此外,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中也指出,在学校教育方面的方针与具体实施计划是:反对帝国主义基督教的教育;反对国民党奴化教育;反对复古教育和私塾教育;反对军阀教育等。

1932年6月,江西省永新县召开工农兵苏维埃第四次全县代表大会,通过了《文化教育问题的决议案》。《决

议案》指出:要“加紧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国民党文化教育及复古教育的宣传鼓动工作”,^⑧使群众明白这些教育都是“束缚欺骗毒杀青年的工具”。^⑨

1932年8月,湘赣省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在学校教育方面,教育原则是反对帝国主义基督教教育;反对国民党党化教育;反对复古教育;实现共产主义教育。^⑩

在反对这些旧思想时,由于它们对群众影响的程度不同,就要采取不同的办法。对于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必须从教材和教法中坚决地清除,不破除这种反动的思想,就不可能在群众中破除以国民党为正统的观念。帝国主义的思想在偏僻农村的影响和城市不完全相同,但仍然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封建思想在群众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并且越是落后的地区,群众中的封建思想就越严重。为了解决群众中这些思想问题,首先要在群众中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阶级的教育。要运用群众切身经历的事实,亲身的感受,特别是用地主剥削农民的事实来进行教育。要正确区分国民党反动思想同群众中封建落后思想的界限。对于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必须坚决斗争;对于群众中的封建落后思想,要注意逐步的引导,要坚持马列主义的正面教育。

这里还必须指出,在苏区教育发展过程中,“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在文化教育工作中也有所表现。“左”倾机会主义的文化教育路线,就是不从当时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际出发,而是机械地照搬苏联教育的经验,认为当时苏区的教育就应该是共产主义的,使苏区的教育工作受到了影响。

总之,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进的。对文化教育工作在战争中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认识,无论是干部或者群众都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往往在这个时期里重视了教育工作,而在另一个时期里又忽视了教育工作。这是因为教育工作和直接的战斗工作不同,不是一时的直接的战斗,而是经常持久的工作。正因为如此,就需要领导者努力学会辩证地处理教育与战争的正确关系。

(3) 苏区教育的艰苦坚持阶段(1934年10月—1937年7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作战略转移,离开了中央苏区,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苏区留下的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干部,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坚持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同时,其他苏区的红军也先后进行了战略转移,留在原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干部,也开展了游击战争。

在这个阶段里,苏区的教育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红军在转移过程中的教育,一方面是原有根据地的教育。

红军主力在长征过程中,适应紧张的战争环境的需要,干部学校大量合并和缩编。尤其是军事学校一律保持随营学校的性质,不仅在重要的战役、战斗中发挥突击队的作用,而且结合作战、行军、宿营、警戒、侦察等活动进行教育和训练。坚持了边战斗、边训练的方针。

长征途中在红军中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其主要形式是结合形势和具体任务向干部战士进行宣传鼓动和政治动员。当时,各部队都配备了宣传队和宣传员,他们在行军中和部队休息时采用歌舞、戏剧、快板甚至喊口号等各种形式来活跃和丰富部队的文化生活,鼓舞部队的士气,统一部队的思想,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徐特立的回忆,红军在长征过程中,除对干部和战士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外,还进行识字的教育,有的部队在战士的背包上写字,有的在战士的斗笠上写字,让走在后面的战士学认。

红军在长征过程中还向沿途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使广大群众知道了“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⑪向沿途群众宣传的办法主要是召开大会演讲和刷写革命标语。红军在遵义期间,就派出宣传干部在当地进步学生组织的“红军之友社”的积极配合下,上街张贴标语和演讲,还召开了万人大会,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使当地群众迅速知道了“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大篇道理”。至于墨写和石刻的标语,在红军驻扎和行军路过的地方俯拾皆是,有许多标语一直保存到了现在。这些标语的内容被广大群众口口相传,发挥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在这一阶段里,南方各苏区的教育事业遭受了敌人的摧残与破坏,学校有的停办了,有的改变了性质,有的校舍被烧毁,师生被屠杀,许多列宁学校变成一片废墟。但是革命的教育事业还在继续坚持着。例如,鄂豫皖苏区在红军转移后,就有许多教育工作者深入到了大别山中的小村小庄,克服重重困难,重新办起了各种形式的革命学校。

在这个极端艰苦的阶段,尽管许多苏区都处在游击环境里,但对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的教育一刻也没有放松。例如:皖赣特委采用办训练班的形式,抓紧时间对党员进行党章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的一致。还有一些南方游击根据地的党政领导机关,通过布置工作、检查工作和总结工作,对

干部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和革命前途教育,要求革命干部要站稳立场、坚定勇敢、不动摇、不变节、联系群众、关心士兵生活,对坏思想和坏作风进行坚决的斗争。

对红军游击队的教育在这个阶段也抓得很紧。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清剿”,部队就组织干部战士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

在苏区无论是军队与地方,还是学校与机关,到处都有俱乐部、游艺室、演出队、歌舞团等等。在战斗的间隙,在山顶与田间,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可以听到嘹亮的歌声,或者真人真事的艺术表演。虽然其艺术水平总的来说不算高,但它对活跃人们的生活,解除人们的疲劳,鼓舞人们的斗志,曾经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苏区无论遇到胜利与失败,成功与挫折,绝大多数的人们对未来都充满着信心 and 希望!

2. 苏区教育的成就

不了解或不大了解苏区的人们,认为苏区就是打仗,就是斗争,谈不上什么教育工作。其实,苏区的教育工作,参加人数之多,从红军战士到干部,从军队干部到地方干部,从儿童到青年,从青年到成年,甚至老年,从男人到女人,几乎都参加学习。它所创造的学校之多,教育形式多样化也是空前的。在苏区到处是识字班、识字组、夜校、半日校、问字所、俱乐部、识字牌等等,还根据工作的需要与可能,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苏区就是一个大学校。就这方面来说,苏区教育发展的规模超过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不仅如此,国民党统治区的学校,大多是“死读书”,苏区教育突出的优点就是教育和实际联系,和革命斗争结合,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方法。可以说,当时苏区的教育是在整个黑暗的中国里的一盏教育明灯,它吸引着革命根据地内外工农劳动群众及其子女。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⑩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还刻画了关于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一幅蓝图。他更集中、更全面、更准确地概括了教育工作的经验,为苏区教育制定了总方针和总政策。由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反转过来又推动了各个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苏区当时处于分割的状态,遍布全国十多个省区。因此,从整个苏区来看,学校没有统一的完整的统计数字,但从部分苏区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到成绩是很大的。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里,毛泽东说:“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有识字组(此项只算到江西、粤赣两省,福建未计)32388组,组员155371人,有俱乐部1656个,工作员49668人。”^⑪这是中央苏区一部分的统计。

苏区许多地方,学龄儿童的多数是进入了列宁小学校。例如兴国学龄儿童总数20969人(内男生12076,女生8893),进入列宁小学的12806人(内男生8825,女生3981),失学的8163人(内男生3251,女生4912),入学与失学的比例为60%与40%。苏区很多地方的儿童们,用了大部分时间受教育,做游艺,只有小部分时间参加家庭的劳动。儿童们同时又组织在共产儿童团之内,这种儿童团,同样是儿童们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苏区社会教育也没有完整的统计数字,但仅就下列地区的社会教育状况,也可以说明它成绩斐然。

闽西苏区上杭县才溪区扫盲工作进展很快,至1934年1月,全区8782人,除小孩外,有6400余人。其中能看《斗争》的约有8%—9%,能看《红色中华》报与写浅显白话信的约有6%,能看路条与打条子的约有8%,能识50字至100字的约占30%,能检查普通路条的妇女占30%,估计不识字的只有10%。在文化十分落后的地区,不长的时间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实在是不容易的。

苏区为了提高妇女的政治文化水平,在各种群众学习组织如识字班、半日学校、夜校都注意吸收妇女参加。

例如兴国夜校学生15740人中,男子4988人,占31%;女子10752人,占69%。兴国识字组组长22519人,男子9000人,占40%;女子13519人,占60%。在兴国等地,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女活动也积极起来。妇女不但自己受教育,而且已在主办教育,许多妇女担任小学与夜校的校长,或是教育委员会与识字运动委员会的委员了。女工农妇代表会在苏区是一种普遍的组织,它非常关注劳动妇女群众的整体利益,妇女教育当然是他们注意的一部分。

群众中识字的人数在迅速增加。识字的方法有夜校、识字组与识字牌。夜校有一定的地点,识字组在群众的

家里,识字牌在道路的旁边。领导识字运动的机关则为乡和村的识字运动委员会。拿兴国来说,全县有130个乡的识字运动总会。561个村识字运动分会,3387个分会下面的识字小组,22529个加入识字小组的组员。这是扫除文盲的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曾经向着全苏区一切城市和乡村中间开展。

鄂豫皖苏区商城县全县127个乡中,共办列宁模范学校14所,有学生2100人;列宁小学60所,有学生3600人;各种识字班(包括妇女识字班、成人识字班、读书班、夜校等)360处,参加学习的工农群众有3800多人。^[4]

引证上面的统计材料,说明了苏区群众教育发展的情况。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在国民党统治区纵有少数热心群众教育的教育家,也只能办少数学校,或者在若干地方做一些普及群众教育的工作,而要广泛地普及群众教育,提高群众的文化教育程度是根本办不到的。

苏区的干部教育在各级共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也取得了很大发展。从教育形式上来讲,不仅注重在职干部的学习,而且还举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和干部学校;从教育内容上来讲,不仅注重政治理论教育,而且还开展各种业务教育,例如,中央政府各部门举办的训练班,即有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等分期分批的干部训练班;从干部教育对象来讲,不仅注重基层干部、一般干部的学习,而且注重领导干部的学习。总之,在土地革命时期,整个苏区是一个大的学校,而干部教育是这个大学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整个学校起着带头作用和核心作用。

3. 苏区教育的历史贡献

作为革命根据地教育发端的苏区教育,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是很重要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苏区教育的革命改变了旧中国教育的性质

旧中国的教育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从教育对象到教育目的、内容、教育方法都贯彻了这种精神。广大劳动群众及其子女整日在穷困中生活,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至于能够在大学读书的,一般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1933年3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特种区域暂行社会教育实践办法”,接着在赣、闽、皖、鄂、豫等省成立了特种教育委员会,提出要教、养、卫三者并重,以教来“纠正”民众思想,养成生产技能,训练地方自卫,这三项同时兼顾。他们所谓的“教”,是法西斯教育;他们所谓的“养”,实质上主要是要工农群众养活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剥削阶级;他们所谓的“卫”,主要是保卫地主阶级、官僚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者的反动统治。总之,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教育。

苏区从创建起,就把劳苦大众的教育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12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5]在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教育,特别是对劳苦群众的教育,是与他们新取得和将要获得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不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就不可能起来打碎旧社会强加于他们的那种沉重的精神枷锁,即不可能达到真正的自我解放。同时,群众思想解放的程度,是和他们自觉投身到革命斗争的行动相一致的。在苏区的教育中,无论是社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从教育制度、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到教育方法,始终贯彻着解放劳苦群众及其子女的精神。

苏区在进行文化教育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革同苏区斗争形势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苏区教育在马列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批判了旧的教育思想,打破了传统的教育制度,结合苏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实际,制定了建设苏区教育的方针、政策。对旧教育的改革和新教育的建立,贯穿着:教育必须与党的民主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任务紧密结合并为它服务的观点;教育向工农兵开门的观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的观点;各级各类学校必须贯彻政治化、生产化和军事化的原则等等。随着这些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的贯彻,苏区教育出现了新的面貌。

第二,从实际出发的苏区教育创造了新的教育体系

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从外国抄袭过来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与教育内容、教育方

法等,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需要。学农的不会种田,学工的解决不了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升学。上小学是为了上中学作准备,上中学同样又是为了上大学作准备,上大学的又是为留洋作准备。这种阶梯式的“预备教育”,早已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批判与指责,这种教育制度在革命根据地就更加行不通了。

在苏区,要办什么学校,不要办什么学校,学习时间的长短,学习内容的选择,学习方法的采用都是根据苏区革命斗争和建设工作的需要。只要是需要的,即便条件不够,存在着种种困难,也要创造条件,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创办学校,培养人才。在苏区,一所学校,甚至一所专业学校,常常只有一位教师或几位教师、一间房子或几间房子、几条桌凳、几本油印教材。很多学校常常只是在学校办起了之后,再逐步创造条件,提高教学水平。例如,徐特立创办的中央列宁师范就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创办起来的,它为苏区培养了不少小学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不仅根据工作需要,还要考虑到教育对象和环境条件等。有的是由小学到干部学校,有的是由中学到干部学校。干部学校亦分为不同的层次。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要由工作到学校,又由学校到工作。学生是把学校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和理论知识带到实际工作中去运用,解决在实际中遇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又带着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自己的经验,到学校中来提高认识,使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寻求正确的解决方法。苏区的干部在这一进一出的过程中,他们的经验、知识和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推动了工作的前进。

苏区教育的发展是和苏区的发展相联系的。苏区在开始创建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是先由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深入,就逐步开展了红军的教育工作。离开了红军教育,就不可能使农民参军后逐步地成为坚强的红军战士或干部。这种教育工作,先是注重日常战斗中的教育,或利用战斗的间隙进行教育,然后逐步发展军事训练班,和军事干部学校。在革命根据地巩固与扩大的基础上,又逐步发展根据地的社会教育与普通教育工作。由于社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普及与发展,由于群众政治思想觉悟与文化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扩大了红军,进而又扩大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这是各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共同规律。正因为如此,苏区的教育首先是红军教育、地方干部教育,然后是群众教育和普通教育。这种教育体系,不是任何人从头脑中想出来的,而是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逐步在教育实践中形成的。

在苏区的教育工作中,正确地或比较正确地解决了教育工作与中心工作的关系问题。在革命战争中,战争常常是波浪式前进的,在敌人“围剿”与红军反“围剿”的时候,苏区的一切工作都要为战争服务,教育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苏区的教育,无论是干部教育、社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一般都做到了战争或其他中心工作一来都能积极地配合并为之服务。当战争或其他中心工作一结束,就迅速地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建立起正常的教学秩序与工作秩序。许多教师和学生逐步地学会了把学习和工作结合起来的方法,从而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

总之,从革命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苏区创立了一种由红军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普通教育组成的新型的教育体系。

第三,苏区教育培养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

几千年来,中国的教育是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相对立,有书本知识的人瞧不起劳动人民,看不起生产劳动,看不起实践经验。苏区教育从一开始就克服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对立的状态。

苏区的知识分子,大体上是由三种人构成的。一种是外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当然,在这些人中受教育的程度高低不同;一种是由工农积极分子中培养出来的;另一种是本地原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小学教师中,这种知识分子为数不少。从总体上来看,苏区对于知识分子是采取团结、教育与改造的政策,为他们创造了工作、生活与学习的条件。在工作和学习中,他们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逐步克服了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观点,不仅向书本学习,而且向实际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由工农积极分子中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大都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生产经验,与劳动人民有着深刻的联系,当他们学习和掌握了政治理论与文化科学知识之后,便能更好地与实际经验结合起来,和劳动群众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

苏区干部的培养大致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在职干部的学习。从红军干部到地方干部,从党的干部到党外干部,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并且学习的内容往往是适应工作需要和工作结合的,学习的方法也往往是和斗争相适应的。整个苏区就如一所大学校。另一种是训练班和干部学校的学习。训练班有的是在职业余的,有的是离职脱产的。干部训练班和干部学校学习的方式与学习的内容是随着苏区发展与巩固的程度不同而不同的。但在这些学校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仅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文化知识和科学知识,还

要有计划地向实际工作学习,向战斗学习,向生产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

在苏区十年革命斗争中,究竟培养出了多少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尚没有完全的统计材料。单就鄂豫皖苏区来说,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后改名为彭杨军政学校)培养军政干部和特种兵专业骨干1000人以上;在红四方面军中,各军、师、团、营所开办的红军学校、随营学校、教导队、赤卫军、训练班,共培养军事干部和技术骨干5200多人。

马克思主义是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概括出来的,它又必须重返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指导实际的工作。苏区培养出来的干部一般是沿着马克思主义这条认识路线工作的。苏区的干部不仅学习书本知识,更主要是学会善于分析和解决革命工作中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而推动革命工作走向了新的胜利。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5页。

② 《闽西苏区教育资料选编》,1986年8月内部出版,第36页。

③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④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1月版,第15页。

⑤ 《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7页。

⑥ 《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一),1985年6月内部出版,第79页。

⑦ 《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628页。

⑧⑨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4页。

⑩ 参见《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一),1985年6月内部出版,第124页。

⑪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50页。

⑫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9月版,第12页。

⑬⑭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8页。

⑮ 参见《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2—163页。